

SUOWEI YIREN

# 所谓 伊人

——女性创作传播的“语境”阐释

薛中军/著



D00305454

上海大学出版社



SUOWEI YIREN

# 所谓 伊人

——女性创作传播的“语境”阐释



薛中军 /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 数据

所谓伊人 / 薛中军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3.10

ISBN 7-81058-632-7

I. 所... II. 薛... III. 1. 妇女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 2. 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91843号

---

## 所 谓 伊 人

----女性创作传播的“语境”阐释

薛中军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延长路149号 邮政编码200072)

(e-mail:adchbsctiz.net 发行热线56331131)

出版人:李顺祺

\*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字数 200 000

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050

ISBN 7-81058-632-7/G·256 定价: 15.00 元



薛中军，女，笔名雪莹。博士、主任记者、专业学者，现为上海大学副教授。曾出版专著《放眼红尘》、《解析危情》、《长寿盒》、《现代女性创作新观》、《新闻评论》等。理论上，她致力于新闻学、“女性文化发展”等专题研究，在国内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有的论文获奖，有的被收入专集，被评论界称赞为总有“能见人之所不能见，能言人之所不能言”。

做过多年专业记者的雪莹在采访、发稿方面曾有“快枪手”之称，文笔以清新、富思辨色彩见长。国内数十家报纸及期刊杂志还发表她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通讯、评论等百余万字，许多作品获全国、省、市级奖。文集《女记者们》、《心织笔耕》、《实践宗旨的人们》、《希望的太阳》以及《中国人才报》、《全国晚报文萃》等都收有她的许多佳作；作品曾被改编成电视剧本《边缘情感》，她的长篇电视剧小说《红颜惊梦》已在筹拍当中。

## 质疑与嬗变

### ——并非题外话的自序

福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去驱散那些熟悉的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而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福柯的这些话概括了笔者写这本书的一点初衷。

作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福柯的巨大功绩不仅是改变了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也给世界范围的女界带来了新思想、新的生存意识、新的理想境界。正如福柯所说：“长期以来，他们试图将女性限制在性的领域。多少世纪以来，她们一直被告知‘你除了你的性之外什么都不是’……”(Foucault, 1988, 115—116)而在今天，中国女性解放的最大弊端，就是在平等的口号之下，使许多优秀的女性承受着更多畸变的压迫……或者是所谓“事业型”的女性一定是“一种实在说不上怎么美好的雄化女人”，必然要与雅致、魅气、漂亮无缘！否则就一定是有什么不对的“规则”了。其实质仍然是“男权变态思想”在作祟，不仅与现实世界相违背，更与女性的发展实际相背离。



诚然,思考问题的方式变了,规则与体制也在渐进中嬗变,它与质疑相联,与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相关。而对于现当代的中国女性来说,她们实在有着太多太多的成就,也有着太多太多对规则与体制的质疑,有着太多太多的嬗变。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她们成就了自己的梦、女人们的梦,也成就着人类共同的梦。

的确,正如朦朦胧胧的,每个人也都曾有过自己的梦一样。

记得上中学时,爸爸用红绸布包手枪放进枪套的形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我所见到的女兵们更是英姿飒爽。所以,我那时的梦想就是长大当一名女兵。这个梦想没有付诸实现,因为我上了大学。可直到如今,我仍不能释怀,常常为没能穿上那身戎装而遗憾、懊丧。然而,我也一直记着长者们的教诲:只要肯吃苦,努力学习进取,女孩和男孩一样,无论做什么都会比男孩强。所以,我后来的梦,就总与女孩的成才、成长相伴,与女孩要自立、坚强“搭档。”

带着这个梦,上大学的时候,我知晓了冰心,并极端地崇拜她,也因为她,在18岁发表第一篇小说《明月冉冉升起》时,模仿她为自己取了笔名雪莹,取冰清玉洁、晶莹剔透之意。直到如今,除学术论著之外的文艺作品,我多用此笔名。这个笔名蕴含着当时一个青春少女纯真无邪的人格追求和人生梦想,更代表了青年人要实现人生社会价值的一种理想。

随着阅历的增多,我又熟知了丁玲、萧红、苏雪林等等,几乎“横扫”她们的作品与传记,进而又开始偏爱所有“女”字的能人,后来这种偏爱也体现在我从初级记者一直做到主任记者近十年的职业生涯里,那种从骨子里迸发出的激情与“本位”认知,仿佛和我的血液在一起流淌。

终于,有那么一天,我对方方面面的女能人开始能够冷静地审视,从最初的盲目追随,甚至崇拜,转变为理智地认知、理解;从关注她们个性的成长转而去研究她们的社会存在、生活环境、心理动因,并更多地通过她们去反思社会的进步和女性文化的发展。

在研究女性创作传播的过程中,我则总在思索应该如何从古



代、现代的文化背景,中西不同的文化理念上,去理清千头万绪的文本与女作家心理动因的联系,去比较探索女性创作传播的发展及演变的规律,以利当代女性素质的提高及社会的进步。以往,国外此方面的研究偏重于“女权”的政治内涵;而国内此方面的研究,大都习惯于从意识形态的变化去推导创作主体的变化,社会政治历史观比较强。我以为,从上述“政治意识”的视野来论证女性创作虽然可行,但价值不大,也许从“存在”环境、话语特征、心理动因方面去分析,才更具现实意义。因为,我一直认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在一定的阶段里,创新意识、问题意识、导向意识往往更为重要。

说起来,动笔之时可谓忽而千头万绪,忽而踟蹰不前。一则因为女性创作传播,它牵涉的生活领域太宽广,美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而其本身更是一个不断积淀、不断延续而又不断发展的一个动态性结构;二则,对于自己某些跳出原有史学界“本位”的品评观,惟恐多有偏失和冒犯。本来嘛,作为一名未究天人之际的后学,只应埋头学习精进就已足矣,而在此品评大方之家岂不是不知天高地厚?更何况创作、传播之领域洋洋之大观?

然而,我认为品评也是一种学习和精进的感悟,所谓“通古今之变”,应该是各有各的学法、通法。因此,通过潜心之志,也便有了这拉拉杂杂,很难登堂入室的“一家之言”。所以,还望大方之家多多海涵。

人常说“敝帚自珍”,虽然所写全是出自真情实感,但由于自己的文笔并不精萃,思想难免偏颇,惟恐其连“帚”都不是,便不敢自珍。本书在成稿过程中,幸得导师孙中田先生及其他学界、业界前辈们的指点与鞭策;承蒙社科院及校学术委员会专家们的理解与涵容;同时得到了金冠军教授、戴元光教授、陈犀禾教授、金丹元教授、孙正聿教授等的大力支持和勉励,他们宁静致远、治学严谨、宽以待人的风范将永记我心;我也不会忘记社科院巫志南博士、才子学长张福贵博士及同仁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正是他们使我陡增了勇



气和力量，虽是落笔不易，也便不揣浅陋，洋洋万言。古人有“朝闻道则夕死足矣”之说，倘若以此之拙笔，能引来大方之家的“真传”，也便足矣。借此机会，请允许我向所有施恩于我的人们一并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谢意！我当好自为之来感念这份尘缘。

说起来，生为女人，许多同胞爱说难、难、难。的确，因为学习忙、工作忙、家务忙，动起笔来，专心致志何其难！我是在历时无数个静谧的夜晚后，在一个平平淡淡的拂晓，为书稿打上句号，关上电脑的。就在那恬淡而宁静的时刻，我知道在某个地方，定有同样的女同胞在与我为伴，并一起迎来这又一个黎明。正如我知道，这个拂晓里打上的这个句号是暂时的，因为“学海无涯苦作舟”一样。

生命是一种缘，但愿通过这本“生为女人”之视界，能够捕捉到一点点心灵的共鸣之缘；并通过我的某些不成熟的理念积累，引起他人更为深层的哲学思考，以利于女性及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作为出自“名不见经传”之手的一本书稿，虽然谈的是女性创作及文化传播，但本质上是要表达一种对女性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亚种”的一种反思和批判，正视的是人间的普遍问题，很多部分出自我几年前或新近曾发表过的一些学术论文的思想，有着一种“孤胆英雄”式的诉求，难免有挂一漏万的粗糙之处。尤其是文中难免有标新立异而又不成体系的论述，能否自圆其说，恕不敢妄断。但笔者相信“女子未必不如男”的常言，更何况所写虽不是醒世致用之恒言，有扭转乾坤之力，但只要跳出拾人牙慧之圈子，独辟境界就略感安慰。何况，“学无止境”，可以有错必改呢？总之，对于女性创作传播来讲，它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系统，是要在质疑与嬗变中前行的，是要面对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大目标，这也应该是“母题”最伟大、最崇高的价值所在。另外，该书中每章篇头都用了一段引语，或抒情或寓理，旨在“隐喻”和象征。

综上，由于笔者才疏学浅，水平有限，加之付梓仓促，所以论证不周之处在所难免。真诚地征求学界同仁的切磋与探讨，更期盼得到前辈专家的不吝指教与批评；尤其对有所冒犯之处，乞谅。



◎ 质疑与嬗变——并非题外话的自序

再次向所有施恩于我的人们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和谢意！对出版社同志付出的精心劳动也一并致谢！

薛中军

2003年8月中旬于上海大学



# 目 录

自序	质疑与嬗变	1
导言	在解读与重构之间	1
第一章	文本的颠覆	12
	一 沉重的“羽翼” / 12	
	二 “语境”范式的反叛 / 15	
	三 求同与存异的视域 / 17	
	四 “人”的框架中“女禁”的开放 / 19	
	五 “造命”的“自觉”与“发现” / 23	
	六 本能与至诚的“契合” / 26	
	七 话语中心的“位移” / 29	
	八 女性“认知”的独特“观照” / 32	
第二章	“失语”的回归	37
	一 感伤的调子 / 39	
	二 脆弱的“停滞” / 44	
	三 浮出“地表”的迷惘与无奈 / 47	

- 四 同性恋的“隐喻” / 50  
五 童真与母爱的颂歌 / 52  
六 女性话语的多向选择 / 55

“领悟模式”的诗意呈现

59

- 一 诗化与“原型” / 59  
二 “宇宙的爱”及自主情结的升华 / 64  
三 “天人合一”的美学意趣 / 66  
四 开出爱的济世良方 / 70  
五 生命文化意识的讴歌与诠释 / 73

冲破“菲勒斯中心”的爱的证明

79

- 一 投向死寂文坛的一枚“炸弹” / 79  
二 以“力比多”为支点的情感符号 / 82  
三 冲破“小我”的“大我” / 87  
四 “女性所指”的变迁 / 91  
五 “空洞能指”的局限与遗憾 / 96

原创气韵的积淀与升华

101

- 一 “天籁”语境的多重意指 / 101  
二 通灵感应的“异质同构” / 104  
三 “小说学”的“越轨”与“出格” / 107  
四 “酒神”精神的再现与深化 / 109  
五 理性的“自然之光” / 112

## 都市女性话语的建构

119

- 一 “生物性滞留”的疑问与剖示 / 119
- 二 “原罪意识”中的女人 / 121
- 三 “女奴”角色的“谢幕”与隐退 / 123
- 四 男权文化“基因”的展露与描摹 / 126
- 五 独特的“格式塔质” / 129
- 六 “有意味”的“传奇” / 134
- 七 都市女性话语的建构与追求 / 139

## “元语言”传播的困惑与失衡

144

- 一 “母亲神话”的倒塌 / 144
- 二 “阿妮姆斯”的过剩 / 147
- 三 话语“生态”的倾斜 / 150
- 四 社会心态的失衡 / 150
- 五 女性主体的“集体无意识” / 153
- 六 “返朴归真”的期盼与反思 / 156

## 文本的“自律”与“他律”

161

- 一 “性与文本”的超越 / 161
- 二 “偏正结构”的补救与平衡 / 165
- 三 文化人类学的指归与定位 / 169

喧嚣与躁动

173

- 一 精英创作的边缘化 / 174
- 二 “统一场”的必由之途 / 176
- 三 “综融之博”的融合 / 179
- 四 冲出“中、西、体、用”的樊篱 / 182

“张力”作用中的当代女性创作

186

- 一 作为“另类”的“语境”阐释 / 187
- 二 关于“侵略”的“悖言” / 189
- 三 策略与姿态 / 192
- 四 打破“文化危机”症候群 / 195
- 五 走向人类理想的家园 / 197

附录 / 201

主要参考文献 / 215

## 导　　言

### ——在解读与重构之间

我们知道，文本作为符号的载体，是他人的生命活动向受众的“传达”，是通过符号形式所进行的文化交流。在这个交流中，受众不但了解他人，了解世界，同时也了解文化的“历史”和“传统”，并通过文本中所显现的他人的“观念”来了解自己的文化处境，了解人们“绘制”的未来的文化图景。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人们所“解读”的“文本”就是人们以文化的方式感悟世界的前提条件和现实资料；同时人们创制的“文本”，就是作为文化存在者的人们向他人、向世界“诉说”自己的文化水平和文化体悟的存在方式，也是一种“重构”。对“文本”的“解读”和“书写”，实际上也就是人作为文化的承担者的存在方式，是为了更进一步的文化“重构”。当然，人的意识的提高，精神的进步，世界文明的进化和发展，都是在人的“解读”和“重构”的递进中发生的。

关于女性创作传播的研究应该相关于女作家文本的解读、女性主体的审视和评介、受众的接受研究等。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以往它曾更多地阙于男权文化中心形成的“创作传播传统”的框架，虽然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可喜的局面出现了，对“女性”的拒斥有所好转，并不泛溢美之词。然而，正如文化的目的和文化的路径永远是每个时代必然面临的“新”问题一样，每个时代审视它已有

的文化结构、程式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解决新时代和未来的问题。所以，关于女性创作传播的研究也便仍然需要“解读”和“重构”。

女性的话语方式千差万别。“我们今天的女性解放的最大弊端，是在平等的口号之下，使许多优秀的女性承受着更多性别畸变的压迫。一个可悲的社会现实是，在与自己的天性奋勇地作了一番殊死抗争之后，许多所谓‘事业型’的女性，失去了太多的女性特质，成了一种实在说不上怎么美好的雄化女人”。

女性思想的提升和智慧文明的发展以及生活状态的改观，无不与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思维向度、文化进步等相关联。关注女性、环境和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在人类的生存、调整、发展中创造更美好的人类未来，这是现实世界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所在；那么，如何在关注现代女性创作的本土文化内涵，吸取其精华并使之发扬光大的同时，让目前的当代女性创作，呈现更加丰富的两性视野，将对中国当代文化转型期的文化充实和重构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研究女性问题的目的并不只为女性，而在于提高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

20世纪，对于中国的文化而言，是由传统迈向现代的重大转变时代。因此，研究女性在文化上的作用，研究女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中的作用、贡献、影响，分析考证中国现代女性创作在文化内涵和传播方面曾经有过的得与失、困惑与迷惘、倾斜与失衡等等，探寻加入WTO后多元共生文化景观下，女性创作的“语境”阐释策略，对促进当代女性创作文化信息传播、信息反馈，促进“双性视野”下人类美好精神家园目标的建设和实现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

自1995年9月1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妇女论坛之后，世界各国的进步妇女以其或火爆或婉约的形式，更加强烈地呼喊出了人类一半人口要求平等、发展、和平的声音。但是，由于在历史和



现实中,关于女人的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性别歧视的污染,人类文化中还充斥着“厌女主义”的话语,因此,西方世界中女性的进步,往往表现为“女权主义”。这是因为,挪威奥斯陆大学贝丽特·欧斯教授所阐述的《五种压制妇女的方法》还到处存在;社会对女性的“双重要求”和“双重谴责”等软性策略压抑,仍然在很多方面窒息着女性的自尊。

正是在这种女性主义思潮引导下,国外相关于“性别”的研究著作,一直具有多学科相交叉的特点,呈现以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为主的态势。如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女人》、陶丽·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伊瑟尔的《走向文学人类学》等。这些研究成果,为人文科学反作用于人类的发展进步,使人们更好地调整生存状态,构建更适合人类发展进步的文化版图,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帮助。然而,这些研究也同时存在着某种局限,比如,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就“性别”而谈“社会”、“历史”的津津乐道,在“女性主义”、“女性创作”等一些最基本概念和范畴界定上,没能逃脱女权主义的框架。反映在文学上,则几乎没有纯理念的文化思想,更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观、批评观等,取而代之的只是“仇男”的女权主义。

西方这种女权主义式的文学理念,直接来源于法国的解构主义,按照福柯和德里达的观点,女性对男权中心文化的有效抵抗只能是“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而事实上,我们反对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但不赞成西方女权主义者以决然的态度,使男女两性长期处于分庭抗礼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世界性女性主义文学及文化发展研究,尚处于理论匮乏、思想迷惘的起步年代。

中国女性人口占世界相当大比例,因此,中国现代女性创作发生发展的规律、当代女性创作的特点以及未来走向等,在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进程中都有着一定的代表意义。对此,相关的研究和探询将会为世界范围内的女性创作提供一定的导引、范式。这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相关于女性“性别”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原因之一,这些研究显示了社会学与历史学相互融合、碰撞所产生的思想火花。



如李小江的《性别与中国》、张中秋、黄凯锋的《超越美貌神话》、阎纯德的《中国现代女作家》、李少群的《追寻与创建》等，其中大都在社会历史批评观的框架内，探讨了现代女性创作复杂的社会效应，以及女性主义思潮产生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等等。

近几年来，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上，对中国现代女性创作以及文化传播的探讨、研究，出现了可喜可贺的局面，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视野和格局。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某种局限，国内就有关方面的研究和探寻，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空白和诸多问题。比如，存在着以政治论、身世论代替创作论的问题；存在着单纯停留在社会历史批评观基础上的问题；有的则以印象、感性分析见长，存在着人云亦云的浮华、泛泛化以及重复性评介多、理论建构少的问题等。面对从主体研究向文本解读阐释的调整，从主体认知向受众接受心理方面的转型，其文学批评观、创作观也有着一定的滞后与局限性，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羸弱”与力不从心。

我们知道，人作为文化的创造者，他在创造一个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世界的同时，也“创造”着人自身。实际上，人自己就是文化物，人作为文化实体属于被他所创造的这个文化世界。始发于 19 世纪后半叶，到 20 世纪初达到高潮的西方女权运动，为广大妇女群众争得了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的权利和机会，并为东西方的全体妇女造了福。进入 20 世纪以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几度高涨，大都与西方一定时期内女权运动的升温有某种关联。再者，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第一批女作家也主要是受到西方及“东洋”一些现代思潮的影响而觉醒。无论是陈衡哲、冰心、凌叔华、冯沅君，还是白薇、庐隐、谢冰莹、林徽因、杨绛等人，她们多数都先后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留过学。她们的文化营养虽然首先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得益于西方及“东洋”文化的浸染也是不容否定的，那些来自国外的文化因子在她们的生命及创作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此种作用的影响因素，她们最初的写作，有着脱离中国传统女性写作模式的创新精神。

